

传

统



忠烈人格

旦刺客认定他受到某位恩主的知遇，他鲜血与生命实际上在他接受礼遇的那一瞬间，而交给那位恩主了。这是因为在战国时代重就有相应的亡命报恩义务，知恩不报是士的奇耻大辱。为什么要以死报恩呢？

《吕氏春秋·知士》也说：“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可见以死报恩乃是高扬士义，突出士的人格力量，宣泄士的慷慨之气。士之报恩的方式愈是激烈悲壮，其所获得的社会赞誉愈多，其生命的光彩就愈是光辉夺目。

匕首劫持齐桓公，这是要冒着被杀头的风险的，但他舍生忘死，在外交场合上收回战场上失去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鲁庄公的知遇之恩。

文

「刺未果。」趙襄子看他為恩主履行复仇了他。豫让为了继续行刺，便采用毀

八

陈桐生著
刘怀柴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烈人格/陈桐生 刘怀荣著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1

ISBN 7-5354-1381-1

I . 忠…

II . 陈…刘…

III .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N . G · 41

策 划:李鸿文

责任校对:陈 琦

责任编辑:李鸿文

常桥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625

版 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60 千字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5354-1382-1/G · 95

定价:13.00 元(简精装)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D7612

忠烈人格

陈桐生

刘怀荣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人格丛书

97
K203
189
2

目 录

引论	(1)
士为知己者死	(4)
一、情感的荒漠	(5)
二、知遇的甘霖	(12)
三、悲壮的一幕	(18)
四、赢得生前身后名	(25)
五、刺客的闪光点	(26)



C

420897

进亦忠 退亦忠	(30)
一、危难之前的选择.....	(31)
二、时代烙印.....	(42)
三、两种人格的比较	(51)
 灵均泪	(53)
一、上下求索 九死未悔.....	(54)
二、两千年的问号.....	(63)
三、求异士风.....	(70)
四、巫风浸润.....	(75)
五、时代的灵气.....	(83)
六、客观影响.....	(85)
 另一种忠烈	(88)
一、论歌盛世.....	(90)
二、超越耻辱.....	(97)
三、述往事思来者	(105)
四、文化的力量	(114)
五、过渡特色	(122)
六、今天的启示	(124)

白发丹心为汉臣	(126)
一、从征讨到冷战	(127)
二、终刚强兮不可凌	(128)
三、忠心不负朝廷	(136)
四、图画麒麟阁	(140)
五、三层文化内涵	(142)
六、现代意义	(152)
两朝开济老臣心	(155)
一、功盖三分国	(158)
二、纲纪大基	(164)
三、举国托孤	(167)
四、春蚕到死丝方尽	(168)
五、千古忠烈	(174)
六、风范长存	(176)
板荡识诚臣	(178)
一、闻鸡起舞	(181)
二、人格的转变	(183)
三、砥柱中流	(185)
四、英雄末路	(190)

“诗圣”的人格境界	(194)
一、体验行路难	(195)
二、内省与重建	(209)
三、超越自我之路	(219)
四、“腐儒”深情	(234)
五、后人的再发现	(248)
六、永恒的杜甫	(257)
浩气满乾坤	(261)
一、蝉脱俗吏之中	(264)
二、节士锋芒	(267)
三、临难不辱大节	(273)
四、受命于危难之际	(276)
五、奋臂回天	(281)
六、生与死的抉择	(287)
七、一点并非多余的假设	(290)
梦醒扬州	(292)
一、艰危困苦的得与失	(295)
二、由“泽加于民”到“游戏人间”	(305)
三、“顽仙”本色	(316)
四、板桥人格的历史地位	(325)

后记 (329)

引 论

yin lun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是摘自《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话。孟子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哲人，运用生动形象而又充满气势与激情的语言，揭示出人生的真谛。

在于追求大义，义的价值远远高于生存，人们在生存与大义二者之间，往往通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突出生命的意义，高扬不可屈服的人格力量。这是孟子个人的心声，更是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的忠烈品格的生动写照。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片哺育了忠臣烈士的沃壤。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们的忠臣孝子的学说，由中国文化高度发展而带来的夷夏之辨及尊王攘夷的观念，因战国诸侯贵族竞相尊士养士而激发起来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意识，在宗法等级制中培育起来的敬业守职精神，以及战国士文化那种平治天下的主体气魄……，无一不激励着华夏志士去忘我地奉献才智，去慷慨赴难视死如归。在异族入侵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在政治黑暗君昏臣幸的无道乱世，在君主被辱国家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刻，在恩主大仇未报的时候，在举国托孤、嗣君嗣弱的情况下，在风沙大漠、飞雪苦寒的绝域，都会有义士挺身而出，他们以连死都不怕的卓绝意志，去肩负起种种神圣的历史使命，用他们全部的智慧、汗水、鲜血与生命去弘扬大义。在中华民族这片神奇的英雄土地上，哪里有危难，哪里就会涌现出舍生忘死的英烈，就会有可歌可泣的业绩。是这些

英烈的鲜血，为中华民族的旗帜增添了光彩；是他们舍生取义的精神，构成了民族之魂；是他们大义凛然的壮举，揭示了人性之光。

我们想为这些忠臣烈士们写一本小书。与历史上那些忠烈传不同，我们的侧重点不在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而在于揭示出这些英雄业绩所包含的忠烈人格，挖掘这一人格的社会文化基础与个体心理根源，捕捉忠臣烈士们的精神的光芒，以便让今天的人们从中吸取有益的人格营养。

中国很早就有许多忠臣烈士的动人传说，“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可惜的是时代绵邈，已经难以窥见这些忠烈人格的全貌了。还是让我们从战国时代的忠臣烈士写起吧。

士为知己者死

shi wei zhi ji zhe si

《史记》中有一篇《刺客列传》，传记中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亡命行刺的事迹。在这五位刺客中，曹沫是春秋中期的人物，专诸的生活年代则在春秋末期，但曹沫劫齐桓公之事不见载于《左传》，倒是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春秋公羊传》详载此事，因此极有可能是战国士林根据当时的复仇气氛而在传闻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曹沫和专诸这两位刺

客虽然是春秋人物，但作者司马迁是按照战国刺客的情感基调去为他们作传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战国刺客的人格模式来理解《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位传主。这些刺客的人格是用鲜血和利剑铸成的，他们采取激烈的亡命行刺方式，去履行报恩大义，他们的生命具有激烈悲壮的色彩。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大义的时代，而刺客通过以躯报仇而将这种大义加以强化和凸现，传统的忠烈品格经过感情意气的激发而被推向极端。正像战国文化学术的辉煌为后世望尘莫及一样，战国刺客在中国忠臣烈士的人物画廊中也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一、情感的荒漠

刺客为什么要舍身亡命为人行刺？为什么要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报答恩主？为什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就要揭示刺客的内心情感世界？《刺客列传》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为此提供了答案：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

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绝非矫情伪饰故作姿态，不是招摇过市哗众取宠，也不是看破红尘玩世不恭，更不是及时行乐放浪形骸。这是刺客内心情感世界的真实流露，其中的意味既不脱离对酒高歌涕泪双流，但又超越于歌声与热泪之外。这是英雄寂寞的泪水，这是英雄渴望被人理解、被人赏识和被人尊重的深情呼唤，这是英雄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要求建立不朽声名的呐喊！这是千里马对伯乐的企盼，是对驰骋奔腾的热烈期待！是美酒与友情把英雄们带入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荆轲等人仿佛伫立于空旷寂寞的原野之上，面对着无穷无尽的苍穹而惆怅，而感伤，而憧憬……。在《刺客列传》所记述的五名刺客中，荆轲是一位具有艺术气质的慷慨悲歌之士，因而《刺客列传》对荆轲情感世界的描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刺客虽然没有慷慨悲歌的壮举，但他们的内心何尝不躁动着对辉煌功业的渴望！

刺客为什么具有这种寂寞空旷的内心情感

世界？这就要把他们放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来分析。历史在进入战国时代后，此前的宗法等级秩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趋于崩溃，社会进入更为剧烈的兼并纷争之中。从春秋几百年的血战中崛起的战国七雄，在更为惊心动魄的程度上继续演出血与火的战争活剧。但是，中华民族并未因此失去它的灵魂，自传说中黄帝以来，民族一统的政治理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结束多元多裂政治，重新实现民族一统局面，是战国时期动乱的社会表象之下的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在制约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要统一，就意味着以其中一国灭亡其他六国，所以战国七雄都面临着生存竞争并进而统一天下的问题，而生存竞争最终归结到人才竞争。所谓“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秦策》），所谓“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吕氏春秋·智能》）等等，正表明当时人们对人才重要性的共识。社会把目光聚集到士林阶层身上。士既不像上层贵族那样泰奢荒淫愚蠢无能，又不必像最下层劳动人民那样必须为衣食住行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墨子·贵义》说：“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即表明士这一身份特点。士对

当时天下大势有透辟的分析，具有思想理论、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才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士具有身为布衣而心忧天下的精神，他们面对“天柱折，地维绝”的局面，勇敢地肩负起拯救天下再造苍天的历史重任，他们以巨人的心胸、气魄、热情和力量去从事创造历史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这种特定的身份地位和庄严崇高的目标使士最有资格成为战国时代的政治主角。由于西周宗法等级体制的解体，战国士的概念已不完全等同于西周春秋时期等级制的士，其中既包括众多的像张仪、范雎、商鞅、乐毅这样的贵族庶孽，也有像宁越、毛公、薛公、朱亥、侯羸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无业游民和低级役吏。《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也大体上属于下层士林。当时跻身士林，并不是视其身份地位，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志向与抱负。战国士林正是这样一个志向远大、富于创造进取精神的动态群体。士既为天下重心之所在，于是当时诸侯贵族尊士蔚然成风。赵简主、魏文侯开其端，齐闵王、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继其绪，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扬其波。或尊士为师，郊迎侧席，拥彗先驱；或视士为友，与士分庭抗礼；或以国士待士，礼遇有加；

或与士同衣食，存问养亲；或以贵下士，与博徒卖浆者游；或命士为列大夫，“为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政治的多元化为士林提供了多向选择，而“士无定主”则使士林摆脱了固定的等级隶属关系，给士的相对人格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士有恩则往，恩绝则去，形成一种诸侯贵族求士而非士求诸侯贵族的情势。对于士林来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这种状况与后世文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大相径庭。在士与诸侯贵族的交往中，士可以当面批评、讽刺、驳斥、贬低诸侯贵族，而诸侯贵族也只有不悦、勃然变色而已，并不对士施加任何惩罚。战国士林从不委曲求全，他们并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稍有失礼之处，他们便会改换门庭。赵平原君对魏公子无忌以贵公子身份与博徒卖浆者游稍有微辞，其门客多离开平原君而归魏公子。平原君不杀美人向跛足士谢罪，其宾客亦渐渐离去者过半。而失去士林对于诸侯贵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因为养士程度与尊士程度直接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在当时有“万乘之君，得罪一